

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

■侯奕



萧张故居庭院

学校的大足球场，球场的另一侧是一大片松林。我的父亲在八十岁时这么描写他最早接触到的户外“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了我多少美丽的回忆啊。在雨后新晴的球场上我奔跑欢跳，在松林深处的花丛里我捕捉蝴蝶和金甲虫。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我好象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这个家乡就是世界中心了。……

直到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邻居有个比我大好几岁的伙伴把我带到了远在郊外的一座“沙山”。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我自己那种欢天喜地的激动心情。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大小沙丘，沿着一条古河床，连绵不断地崛起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有些高大的杏树竟被埋在沙丘里，只剩下一些树尖尖了，可是青翠的叶子还依然挂满在树尖上，真是一种奇观。更加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爬到“沙山”顶上回头一望，我家所在的那个人烟稠密的小镇，竟然消失在视野之外无影无踪了，我好象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真大呀。

……正是我儿时和沙丘的这点因缘，使我在成年之后的沙漠考察中一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一直都是在炎热的夏季——也就是利用暑假，深入沙漠，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为此，我终于开拓了沙漠历史地理这项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又哪里是我儿时所能预料到的呢？（《我爱旅行》载《旅行家》1957年第2期）

抡才学校的

的学生来自附近的区县，从小学到初中一七一年制，可以连读，初中那部分又称育德中学。仁之、硕之初入小学时，母亲就教导兄弟二人要爱惜书籍，每一册书都要包好书皮，不得在课本上乱涂乱写，要保持书的整洁。到了小学高年级时更是为他们准备了课外读物，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订购读物的主要是基督教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编辑出版的儿童刊物《福幼报》和一些儿童故事书。母亲又很会讲故事，把《圣经》的一些故事通俗化地讲给他们听。仁之最感兴趣的是描写苏格兰医生、传教士、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因传教而深入非洲内地进行探险的书籍。仁之年轻之后去英国留学，还曾经访问过利文斯敦的故居。侯仁之一生中对地理考察的热爱，应该说最初是来自母亲开阔的眼界，以及培养出来的他对课外阅读求知的浓厚兴趣。母亲还引导他们学习写作，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转到萧张教会医院工作，时有外出。仁之就是从学着给在外的父亲写信开始，先是母亲念一句写一句，逐渐地也就学会了自己想、自己写了。更像儿童学步一样，渐渐学会了去抒写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在北平城里的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游行示威运动也影响到数百里外的萧张镇。仁之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为他换上一身白色衣服又帮他做了一面小纸旗，然后送他和小同学们拿着小纸旗一齐去参加示威游行——这就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后来回忆到：“自然是我长大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我真幸运，在我一生所身受的爱国教育中，能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起点。”

二

虽然有父母的爱护，年幼的仁之却一直体弱多病，初中时连续两年因病辍学。父母的好朋友、比邻医院的吴肇春大夫检查出他有心脏不正常的症状。1926年，在一位毕业于东吴大学体育系的远房堂兄的建议下，仁之转往堂兄任教的山东德州博文中学校学。在堂兄的指导下，他晚自习后独自一人在操场练习长跑，坚持了一段有计划的训练后，体质明显地增强了。也是在这时，仁之偶然读到冰心的文学创作集《超人》。这本书打开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扉，其中一篇题为《离家

的一年》，而这也正是仁之首次离开家乡萧张的一年，心中共鸣，更加引发了他热衷课外阅读和动笔写作的兴趣。

1927年硕之入德州博文中学校。暑假时两人同回萧张小住，有父有母，家庭团聚。那时硕之已看过《日知录》，对天文产生了兴趣。晚间在庭院里乘凉，父亲、母亲坐在椅子上，手摇羽扇，谈天说地，闲话古今，兄弟两人抬一只床在院子里，躺上面仰看天星，免得脖子发酸。

读初二时，仁之参加了爱国活动，演出的剧本选用了1925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侯曜的话剧《山河泪》，此剧描写的是爱国青年学生对侵略者的反抗。仁之首次登台，在剧中扮演一个女角。这次演出锻炼了他的语言能力，使得他到了初三时有勇气报名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而且有幸名列第一。他写信告诉母亲，希望她能够给殷切期待他成长的母亲带来一点欣慰。母亲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叮嘱他不可自满，还要努力上进。这是母亲写给他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未能保存在下来，母亲的话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1929年夏，母亲病重危在旦夕。父亲把仁之、硕之从博文中学校接回来。在在医院里，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拉着两人的手慢声道：“你们要期末考试了，早点回学校去吧，等放了暑假再来看我。”吴肇春大夫望着他们走出医院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再也看不到母亲去世，没有等到放假，母亲因心脏病去世，安葬在松林南部的公共墓地，碑石上刻‘侯刘氏之墓’五字。”

正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个暑假，为了寄托自己沉痛的哀思，仁之把母亲给他讲过的取自《圣经·旧约》的故事“基督救国”改写成剧本。故事是说，当以色列在外敌人入侵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民族英雄基督说众人克服悲观和失败的情绪，喊出了：“被俘虏的终于得释放！被追的‘终得自由’！”的口号，唤醒同胞和入侵者殊死战斗。仁之正是借古代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故事，抒发了面对当时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剧本后来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鲁祥》半年刊第一卷第二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也能用铅字排印出来的时候，仁之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母亲还健在，她该是多么高兴啊！

1929年秋，仁之遵照父亲的意思转入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准备将来学医。因为齐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而且医科的实力很强。可是因为学潮突起，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停办了，1930年春仁之又转回博文中学。时任校长王元信留美归来，创办了《博文季刊》，仁之被选为主编。他写了《从欧战后印度民族的自治运动说到独立运动》一文，发表在《博文季刊》二三期。因为几年来一直坚持长跑，显露出特长，仁之入选了山东体育代表团参加华北田径运动会。在决赛中虽然未能取得名次，但是长跑习惯已经养成。

然而严峻的升学问题却摆在面前——博文中学校未在政府立案，毕业生不能直升大学。这时仁之、硕之的父亲安排他们同去报考天津著名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这是在1902年由美国人赫立德创办的一所标准英国式学校，英文程度极高。仁之因英文成绩不如硕之，未考取。于是在1931年秋转入河北通县潞河

中学就读高年级。仁之因此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文化古城北平，自此与北京城结下不解之缘。

入潞河仅十余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日深。仁之在10月25日写了《民族的反省》一文，提出自己的见解：要在日本的欺辱之下反省自己，要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非常困难而严重的问题刻在心上，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建设起来，造成整个民族生活的中心，产生整个中心生活的信仰，巩固整个民族“生活”“作人”的力量。这不仅是为了对付日本更是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负的社会使命。”文章刊登在潞河校刊《协和湖》第六期。

1932年仁之自潞河中学毕业。受到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的文章和硕之的影响，他决定放弃学医为个体治病的方向，改学历史为社会治病。初夏，他到燕京大学参加国文、英文特别考试，国文考试由冰心监考。仁之顺利通过考试后获得四年奖学金(学费全免)，入读历史系，受教于洪业教授、顾颉刚教授。

硕之于1930年考取了天津新学中学，获免学费奖学金。硕之这一段在新学中学的经历使他与一位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埃里克·利德尔(Missionary Eric Henry Liddell)的生活轨迹有了交集。

1902年埃里克·利德尔出生于天津。1906年随父母来到萧张。父亲是传教士，他本人后来也成长为虔诚的教徒和传教士。后来的运动天赋也日益显露，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运动员，1924年被选拔赴巴黎参加第8届奥运会。当利德尔得知百米预赛将在星期天举行(按基督教规定，星期天是敬拜上帝安息日)，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遵守教义，退出比赛。英国队四百米选手林赛勋爵主动把自己参加四百米赛的权利让给了利德尔，因为那场比赛不在安息日举行。利德尔在短短时间内改练四百米跑，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在这之后，再次回萧张是三年之后。

1937年6月26日，仁之和硕之一起自天津西站乘火车回萧张。久别的故居，房舍依旧，花园菜畦却不见了，只有那棵杏树独立庭院，显得又高又大。他们徘徊在树下默默怀念早已去世的妈妈。

6月28日晨仁之、硕之到母亲墓前告别。

母亲去世后父亲易地，迁至故城。仁之与硕之到故城去看望了父亲。7月初，在德州火车站，仁之送硕之登车去上海，到闸北水车站完成毕业实习，随后返回北平。

仅仅几天后，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父亲侯仁之和他亲人的命运。

侯硕之自上海去长沙，转往昆明西南联大。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在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工作，之后到四川，在重庆大学任教一年。1942年秋，硕之只身辗转北上入陕西，在投宿凤翔师范的夜间遇害。为硕之挑书担的挑夫逃回报信，详细情况不明。

1937年7月初，亚伯拉罕的真实故事，讲述他们刻苦锻炼，终于在1924年巴黎第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得了冠军。当这部影片上映时，恰好父亲在美国讲学。在兴奋之中，他同陪同他观看这部电影的美国朋友讲述了影片之外同样真实的故事。

硕之就读新学中学高中中获奖学金，连续三年获全班第一名奖，毕业时取得该校创办三十年来最高成绩。学校的英籍校长提出保送他留英深造，专攻英国文学，却遭到了拒绝。侯硕之当时正受着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影响，

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准备献身水电建设，决心投考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33年硕之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学电机工程。

仁之在燕京，硕之在清华。两校比邻，兄弟间交往频繁，相互切磋。硕之不仅有学工学报之志，而且热心科学普及读物的写作，还在高中时就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翻译。硕之将学校当局颁发给他的奖品——英国天文学家琴斯(Sir James Hopwood Jeans)新出版的通俗天文著作《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译成中文，书名《宇宙之大》。仁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替硕之誊清，随后经顾颉刚介绍，由开明书店列为《青年丛书》，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当1950年这本书重版时，侯仁之写了《宇宙之大》再版序——为纪念亡弟硕之作。

仁之入燕大后第二个学期，一位在燕大附中兼课的同屋暑假离校，请他临时代课。这使仁之想到在迈入中学的时候，母亲就流露出对他的期待：“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位子上来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还没有等到仁之能够满足母亲这最初的一点希望时，她就与世长辞了。当仁之站在附中的讲台上，想像着母亲就坐在课堂最后一排，他感受到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他对教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也从代课受聘为正式任课，教了四年多，直到他念研究生。

仁之和学生相处融洽，亦生亦友，周末还带领学生郊游，相得其乐。为了表彰他的成绩，燕大附中授予他刻有“热心教育”四个字的一尊银盾。

大学二年级暑假时，仁之设计了一次独自的长途徒步旅行。他选择了东西横贯华北平原腹地的一条路线，约长三百公里，终点是萧张。在多年后的1986年，他在写给少时同侪耿廷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4年暑假，我只身徒步旅行，自西向东横越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中途经冀州城。在大雨后溯水过冀州城东大洼，又东行三十里到了萧张。傍晚从北会堂借了一把铁锹，到女医院后面那处松林的墓地，在先慈的坟上培了几锹土，洒泪而去。第二天一早重上征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腾。

侯仁之立即返回北平燕京大学，成为复校委员会五成员之一，筹备燕京大学重新开学。

1946年8月他负责英伦，在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地理学院学习。

1949年夏初，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后乘程回国。9月26日船到新河(即现在的塘沽)，27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侯仁之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四

少年的侯仁之走出了萧张。带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家训，带着抡才学校的训勉，带着对行走大地的热爱，带着和索卢河沙丘结下的因缘，带着养成的长跑爱好，带着对课外阅读的兴趣，甚至带着自幼养成的包书皮的习惯——这几年来，当我遵照父亲的嘱咐将他的全部存书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我不得不逐册细心查看，将那些当年因得妥帖贴心的书皮轻轻取下来，露出原来的封面。

母亲的期待使侯仁之选择了终生执教；自幼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践行，为侯仁之的人格特征打了一层底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崇尚科学真理追求自由民主，成为侯仁之一生的指南。

带着故乡萧张植入的基因，带着母亲坟上的一捧黄土，带着化成了西北天空上一颗流星的硕之，带着对人类文明的大爱，带着服务社会的使命，侯仁之在激烈动荡的一个世纪中，修炼着他的学识、气节、理念、眼界和情怀。

侯仁之走出了萧张，走上了一条学者的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侯仁之再没有回过萧张，却也从来没有远离过萧张：

就在他出狱不久，11月20日硕之在陕西凤翔遇害的噩耗传来，仁之悲痛欲绝，不能自己：

可是万也没有预料到，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沦陷区脱出了敌人的虎口，而我的弟弟却在追求光明进步的道路上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我多次在睡梦中惊醒，好像看到了他被鞭笞致死的惨状。我受益很大的洪业师开导我说：“弟弟献身于祖国水电事业的志愿你无法继承，可是为什么不把他决心以业余时间青少年写作科普读物的志愿继承下来呢？”老师的启发，又一次把我从悲伤痛苦的磨难中解放出来。从此，我弟弟少年时代的一个志愿，又开始在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儿时的回忆》，见《中国人读少年时代——风雨年代》）

1943年北平旱情日益加重，麦季绝收，秋收无几。大饥荒中我的祖父侯天成饿死干戈，至死不知幼子硕之惨遭杀害。侯仁之因被判刑，服刑期间无行动自由，不能奔丧。

在那几年中发生在故乡萧张的事件还有：

1939年日军到了枣强

1942年驻萧张的日军占领教堂

1944年萧张教堂被日军破坏

1935年埃里克·利德尔从天津天津新学中学回到萧张。1942年春，利德尔和萧张教会医院的同仁将医院的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转移移给八路军，因此误了运送侨民回国的船期。1943年埃里克被日寇作为战俘抓获，关押在山东潍坊集中营，1945年2月于集中营病逝，年仅43岁。埃里克·利德尔后来被安葬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烈士陵园，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腾。

侯仁之立即返回北平燕京大学，成为复校委员会五成员之一，筹备燕京大学重新开学。

1946年8月他负责英伦，在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地理学院学习。

1949年夏初，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后乘程回国。9月26日船到新河(即现在的塘沽)，27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侯仁之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四

少年的侯仁之走出了萧张。带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家训，带着抡才学校的训勉，带着对行走大地的热爱，带着和索卢河沙丘结下的因缘，带着养成的长跑爱好，带着对课外阅读的兴趣，甚至带着自幼养成的包书皮的习惯——这几年来，当我遵照父亲的嘱咐将他的全部存书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我不得不逐册细心查看，将那些当年因得妥帖贴心的书皮轻轻取下来，露出原来的封面。

母亲的期待使侯仁之选择了终生执教；自幼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践行，为侯仁之的人格特征打了一层底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崇尚科学真理追求自由民主，成为侯仁之一生的指南。

带着故乡萧张植入的基因，带着母亲坟上的一捧黄土，带着化成了西北天空上一颗流星的硕之，带着对人类文明的大爱，带着服务社会的使命，侯仁之在激烈动荡的一个世纪中，修炼着他的学识、气节、理念、眼界和情怀。

侯仁之走出了萧张，走上了一条学者的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侯仁之再没有回过萧张，却也从来没有远离过萧张：

就在他出狱不久，11月20日硕之在陕西凤翔遇害的噩耗传来，仁之悲痛欲绝，不能自己：

可是万也没有预料到，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沦陷区脱出了敌人的虎口，而我的弟弟却在追求光明进步的道路上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我多次在睡梦中惊醒，好像看到了他被鞭笞致死的惨状。我受益很大的洪业师开导我说：“弟弟献身于祖国水电事业的志愿你无法继承，可是为什么不把他决心以业余时间青少年写作科普读物的志愿继承下来呢？”老师的启发，又一次把我从悲伤痛苦的磨难中解放出来。从此，我弟弟少年时代的一个志愿，又开始在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儿时的回忆》，见《中国人读少年时代——风雨年代》）



侯仁之(右)、侯硕之在天津西站